

WEIJIN NANBEICHAO SHIQI
SHIREN SIXINAG YANBIAN YANJIU

魏晋南北朝时期
士人思想演变研究

洪卫中◎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培育基地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中心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许昌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系列学术成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 士人思想演变研究

洪卫中◎著



郑州大学
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思想演变研究/洪卫中著.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5. 12
(魏晋隋唐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5645-2101-1

I. ①魏… II. ①洪… III. ①知识分子-思想史-研究-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4597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 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龙洋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 710 mm × 1 010 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308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 450052

发行部电话: 0371-66966070

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45-2101-1

定价: 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动乱时期,又是我国古代文化思想反思、创新和重组的时期。一方面自两汉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趋向衰微,另一方面外来的佛家和本土的道教却因时兴起和昌盛,因缘于两汉以来新儒学的破产及以之为思想统治方略的两汉统治的瓦解,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思想是在困惑中不断寻找,在寻找中不断破除迷惑。基于此,本书以曹操、萧绎和颜之推为个案与南北朝后期由南入北的士人群体相结合来综合考察,通过对他们思想不同角度的研究揭示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在动乱环境中思想上一般性的取向,以及他们作为社会准则体现者在行为举止上的思想选择。

许昌是中原腹地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曾经是东汉末年汉献帝建都之所,也是曹操统一北方、统治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基于这种地缘优势,许昌学院长期致力于打造魏晋文化研究特色。2007年许昌学院成立了魏晋文化研究所,2012年3月成立了魏晋文化研究中心,同年10月被河南省教育厅批准为“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培育)基地”。在许昌学院科研处和相关教学院部的支持下,魏晋文化研究中心充分挖掘各种资源,整合研究队伍,汇集了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古代艺术史等学科的教学、科研人员,彰显魏晋文化的研究特色。

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中心设立了魏晋隋唐史研究、魏晋文学与艺术研究、中原传统文化研究、许昌历史与文化建设研究等四个主要研究方向。魏晋隋唐史研究既是魏晋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也是学校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科的主要研究方向。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魏晋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自2012年以来,中国古代史已获得了两项国家出版基金重大特别委托项目、两项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及多项省部级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出版学术专著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三百多篇,其中有五十余项成果先后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优秀研究成果奖、许昌市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奖。

此次出版的丛书依据主题内容分别命名为“魏晋隋唐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和“许昌历史与经济文化建设研究丛书”。“魏晋隋唐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由《士族、士人与魏晋隋唐政局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思想演变研究》《魏晋隋唐政治制度史研究》《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习俗研究》《魏晋隋唐文学艺术思想研究》组成。这五部著作的选题侧重于魏晋隋唐时期的历史与文化,主要涉及这一历史时期的士族士人、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许昌历史与经济文化建设研究丛书”由《颍川历史与非

物质文化研究》《颍川士族与魏晋隋唐历史文化研究》《许昌乡村休闲旅游研究》《许昌市旅游业整合优化与深度开发路径研究》《许昌市三国文化旅游产业联动开发路径研究》组成。这五部著作的选题侧重于许昌历史和现代文化建设,这也是积极落实学校“面向地方、服务社会”的办学指导思想、努力服务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践。郡县制时代,许昌是颍川郡的首府,颍川郡的辖区比现在的许昌市大,当时的世家大族虽然在籍贯上属于颍川郡,多数已超出了现在许昌市的辖区,故在涉及许昌历史的两部著作冠以颍川之名。许昌现在的经济文化建设与三国文化有着密切联系,这也是将与旅游相关的三部著作列入后一套丛书的原因。

本次出版的“魏晋隋唐历史文化研究丛书”和“许昌历史与经济文化建设研究丛书”得到了许昌学院领导和科研处等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也得到了郑州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的帮助。“魏晋隋唐历史文化研究丛书”的出版费用由许昌学院科研处魏晋文化研究专项经费资助,“许昌历史与经济文化建设研究丛书”的出版费用由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中心和历史文化学院的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经费、旅游学院的专业建设经费资助。在丛书出版之际,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

许国林

2014年12月

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动乱时期,又是我国古代文化思想反思、创新和重组的时期。因而,于这时期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战争不断,如这四百年间,具有一定规模的战役不下数百次,其中大规模的战役就有二三十次;也可以看到频繁的政权更迭,更可以看到自然灾害的不断发生和流民的不断迁徙。如“魏晋之际,黄河长江流域间,连岁凶灾,几无一年或断。总计二百年间遇灾凡三百零四次,其频度甚密,愿愈前代。举凡地震水旱风暴蝗螟霜雪疫疾之灾,无不纷至沓来,一时俱见”^①。而流民也在这天灾人祸之下大量出现。如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汉人曾有不少南迁,而东北、西北地区不少少数民族也陆续向内地迁移,在关陇、辽西一带与汉人交错杂居;到魏晋时期,仅曹操一次命令,张既就迁徙武都氏五万余落入关中。西晋末年,一方面西晋政权内部因权力结构造成的矛盾引发了八王之乱,十几年的内战造成经济大幅度衰退,百姓不断迁徙以躲避战争,而西晋政治也因此变得愈加昏暗,争取最高统治权及依附者的斗争不仅在司马氏宗室诸王之间展开,也在附庸于他们的士大夫阶层蔓延,势力分据、政不一统、相互剿伐已构成西晋末年国家层面上的整体局势。另一方面以匈奴、鲜卑、羯、氐、羌为主体的少数民族乘机不断涌入中原地带,他们既掳掠百姓以之为奴,又占夺土地弃之为荒地,并于这一过程中建立起政权,加入到西晋末年混乱的战争中。这样,西晋末年不断涌现的战争和不断出现的掠夺便造成不少流民向中南、西南等地区流动,由此又导致了西南、西北、中南地区流民爆发起义,这反过来又加剧了动乱的发展和流民的产生。当然,于这一过程中,也有大量北方流民继续向长江以南及东北和西北偏远地区迁徙,陈寅恪先生

^①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认为：“流向东北的一支，托庇于鲜卑慕容政权之下。流向西北的一支，归依于凉州张轨的领域，流向南方的一支，侨居于孙吴的故壤。”^①

伴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乱发展，一方面自两汉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因失去统一的安定社会环境及儒学本身某些因素开始趋向衰微；另一方面外来的佛家和本土的道教则因时兴起，借助天灾战祸下人们厌倦战乱而渴望生存和安宁、摆脱苦难等得以广泛传播。于是，在这样一丧一兴的变化过程中，人们尤其是享有文化知识的士人们的思想也随之发生着巨大变化：一部分人继续守持着儒学，但他们大多也只是在私塾家门中默然地传道授业；另一部分人则开始反思，对现实的变化和儒学的没落开始做多方面的思考，由此他们或再演形名之学，或重讨法、墨之义，或盛言老、庄之旨，都希望为现实社会开出一套救世方略。最终，贵无崇本的玄学得以和儒学争长短，一时在社会上风靡普兴，以致使“儒墨之迹见鄙”^②。与此同时，社会变迁带来的转眼两重天的变化和宗教本身的精神也使更多的人从此走向信道或奉佛，或在炼丹拜神中追求长生，或在氤氲缭绕香火下跪拜来世，而这其中既有不乏兼信佛道不弃儒学者，也有谈玄论佛以儒为本者。当然，一如上古有巢父、许由，三代之际有务光、伯夷、叔齐、老子，秦汉时有“商山四皓”东园公唐秉、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角里先生周术等隐士。魏晋南北朝时期同样不乏隐士，如杨彪、田畴、孙登、戴逵、陶渊明、宗炳、雷次宗等，于这部分人而言，他们或遵循着“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③，“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或本着忠臣不事二主，或追求着隐逸求名，或长养其志以保其身等，都选择了远离现实政治归隐山林、田园，以自身的言行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世俗社会，激浊扬清，而他们的思想也在变和不变之中发展着。

可以说，因缘于两汉以来新儒学的破产及以之为思想统治理论和方略的两汉统治的瓦解，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思想是在困惑中不断寻找，在寻找中不断破除迷惑，总的都是在或为治国安民或为求生兴家而探索着、追求着，在惨烈中演绎着奋进与卓绝，在悲情中表现着清高与阔达，在散逸中展示着无奈与文雅。

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的思想既是复杂的也是多样性的，但又都表

① 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115页。

② 《晋书》卷四十九《向秀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74页。

③ 《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0页。

现出某些共性。基于此,本书以曹操、萧绎和颜之推为个案与南北朝后期由南入北的士人群体相结合来综合考察,通过对他们思想不同角度的研究以揭示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在动乱时期思想上的一般性取向,以及他们作为社会准则体现者在行为举止上的思想选择与演变。当然,这其中不免也有士人因个体差异而导致的思想不合常态,于此,姑且暂可看作是这时期士人身处变化时代焦虑、郁闷而又渴望实现心中理想的一种表现。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上的这种变化,先辈大家已做了不少深入研究,但几乎都是从哲学角度来予以探讨,如对玄学的探讨、对佛教的探讨、对道教的探讨、对儒释道三者相互影响的探讨等。然而,思想的存在和传播本以人为载体,这其中又多以士人为主,而以士人为对象来研究其思想并进而以此揭示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变化的研究,目前还并不是很多,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有不少可拓展之处,因而本书试图对此做出探讨。

本书分为五章,从不同角度来展示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面对社会变革、政权变迁、思潮变化的思想演变,并尽量由此描绘出一条读者能从中不难发现到的轨迹,那就是在质疑、迷惑、彷徨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在主体上总的还是选择了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和人生准则这一必然趋势和特征。

第一章,从政治变革角度来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政治、政权的变革。政治变革影响着文化观念,继而影响着人的思想改变。在政权变革中,于政权嬗代之际唯我独尊的帝王既有不断被废的可能,政权的存在也就不免会因外交而改变。尽管如此,帝王背后依然存在有一股隐形的神秘力量,它作用于社会意识形态,这使得士人既渴望登上它的位置,又不能不怀忐忑之心,甚至于即使荣登其宝座,而稍不小心即会魂归蒿里。在这一章中,笔者选择这样一个视角,目的是希望摆脱一般性的对这个时期政治演变的概述,并更好地展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斗争的惨烈。但在魏晋南北朝政治变革中,其涉及的事件和现象众多,无论从纵的方面还是从横的方面,学界都有相关著作论说,对上述发生的诸政治事件有详细论述,因而本章笔者就不再以时间为序来述说其变化的经过(笔者还没有能力这样做,即使能做这样的论述也绝对没有先辈大家们做得好),而是选择这一历史时期中涉及的废帝多出和梁末时期后三国之间的外交,以及梁元帝萧绎短暂的帝王生涯三件事来做一点研究,希望读者通过笔者对这三个不相关的事件或现象的探讨能对此时期政治状态及其带给社会意识、士人心理的影响有一个粗略但又不失具体的了解。

第二章,从儒家价值体系的崩溃角度来看儒家之外的文化作用。两汉

时在儒家大一统思想下,其他文化的发展虽没有被禁止,但发展表现出来总体上是不显著的甚至是隐性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儒学的衰微,其他文化元素如“望气”这种属于阴阳五行的文化和地域文化就有了表达的诉求。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的衰微使得士人们不得不去寻找新的替代理论思想,于是他们便回过头来开始重新检讨先秦诸子文化,希冀从中找出治世思想并以之重建精神体系,并尝试着去实践。由于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思想的变化先辈学者已有不少研究,对玄学、佛学、道教等都有较为详细的论说,因而在这一章笔者不想再重复这样的工作,同样笔者也不以思想史的方式来论说,而是仍然沿用上一章的结构方式,选择了曹操在汉末乱世中实政思想、萧绎思想博杂及“望气”这一文化现象为切入点,以个案的形式来展开对士人思想变化的探讨,以此揭示儒学价值体系崩溃后带来的对政治、文化、社会 and 军事上的影响。

第三章,从宗教角度来考察士人们在丧失精神支撑后的彷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崩溃导致士人们精神支柱的丧失;另一方面则是在东汉时期传入的佛教借助汉末道教的兴起也悄然传播着,这些宗教的兴起随着儒学的趋微便不断大行其道,至东晋后期以降,上至帝王下至一般百姓莫不焚香跪拜,这对处于彷徨、迷惘中的士人无疑以极大的心灵诱惑,并因之获得不少精神慰藉。于是,士人们开始纷纷走上信道奉佛之路,因此,士人的思想也发生着与儒学之间的不同层次的变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的研究学界成果异常丰厚,故而在本章笔者同样舍去了一般性的概括性研究,选择的是以颜之推和南北朝后期由南入北的士人群体为对象对此做考察,希望通过取点观面,以个案形式展现出此时期士人对宗教的态度及宗教对他们思想的影响。当然,这样的研究虽不免存在挂一漏万、失之偏颇之缺憾,但冰山一角的揭露总聊胜于无。

第四章,通过不同角度论述士人们在困惑之后最终还是选择儒学为安身立命之思想这一趋势和现象。尽管东汉儒学神学化带来了董仲舒所创建的新儒学价值体系的崩溃,并使儒学发展趋衰,但在经历过对先秦诸子学说的再次讨论、经历过佛道玄文化的冲击和熏陶、经历过政治斗争的不断冲刷和洗礼,士人们经过多方探讨、心理挣扎甚至经历某些实践,在心路求索过程中他们最终还是认同、肯定和选择了有治国救世之功的儒学,并为儒学的发展积极奔走宣扬。不过他们所选择的这种儒学已不再是汉末那种追求长篇累牍解释的章句儒学,也不再是渗透进神学化色彩的谶纬化儒学,而是已褪去汉末谶纬成分的经过郑玄整理并融合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长处于一体的儒学。在这一部分中,笔者主要选择的是曹操和颜之推这两个案例,通过

对他们的研究,表现出这一时期不同阶层士人的这种心理变化。

第五章,从士人其他行为来考察他们对儒学的依赖。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士人们不断触碰或接受着别的文化思想,但在其行为中又往往摆脱不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故而常常不自觉地以儒家思想来指导着自身的言行,甚至很大程度上也有意识地来坚持着它。当然,这其中涉及的因素可能较多,可不论是从文化的角度,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抑或是人类学的角度等来解释,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而言,生长于儒学为主导文化下的社会环境里他们是无法摆脱儒学影响的,他们还是渴望并回归到儒家学说所倡导的那种有秩序、有礼仪、有等级的社会中去,他们想摆脱的不过是经过实践检验而无法再起作用的神学化儒家思想以及假托儒家思想而实干着违背名教的欺世盗名之政治罗网,可以说剥离了神学的儒家思想依然是士人们无可替代的行为理论准则。在这部分中,笔者也没有具体从哪几个方面或角度来论说士人思想的这种变化和取舍,因为笔者暂还没有厚实功底做如此评说,故而还是分散的就不同人、事和现象做出研究,试图通过它们在整体上来表现出笔者所要表达的某种旨意。

当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思想如天空明星而千姿百态、异彩纷呈,士人思想的变化也五彩斑斓,更何况学问深如海洋、无穷如宇宙,所以本书无论如何都没有也无法将这一时期士人思想演变情况予以具体而微或系统而完整地揭示出来,而且本书在结构的安排、内容的选择上既欠完整,也非妥当和完善,特别是对晋至宋齐时期士人思想未能做出研究,不能说不是一大遗憾。因此,本书只能算是笔者探求魏晋南北朝士人思想演变之尝试,虽有求学问、做学术之努力,但更多的在于抛砖引玉,冀博学高明者、俊才深识者来做这方面精深之研究,同时亦盼先达同人予以指教。

— 1 —

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	59
三、道家思想对萧绎的影响	62
四、结论	69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文化的多元发展与“望气”的流行	70
一、“望气”的产生及从事人员	71
二、“望气”的作用	72
三、“望气”的理论分析	78
第四节 六朝政治与吴越文化霸性的发展	80
一、吴、越北上争霸	81
二、孙吴建国称霸	84
三、两晋南北朝吴越士人的霸性奋争	87
 第三章 南北朝的宗教兴盛与士人的宗教信奉	93
第一节 南北朝宗教氛围下颜之推的佛教观	98
一、颜之推佛教观的表现	99
二、颜之推佛教观形成原因分析	104
第二节 梁末南方北迁士人的宗教信奉	109
一、侯景之乱和江陵政权的灭亡造成梁末士人的北迁	109
二、北迁梁末士人对宗教的情感寄托	110
三、北迁梁末士人宗教情结形成原因分析	118
四、宗教情结带给梁末北迁士人的影响	120
 第四章 彷徨与坚持:魏晋南北朝士人对儒家思想的态度	123
第一节 曹操对儒家思想的矛盾心理	127
一、曹操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接受	127
二、曹操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敬畏	130
三、曹操因时施政对儒家文化思想的叛逆	133
第二节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颜之推出仕北迁生活的矛盾内心	138
一、矛盾产生缘起:江陵政权灭亡所带来的亡国生活	138
二、矛盾产生原因:颜之推出仕北朝与儒家思想和颜氏家风的深刻影响	142
三、内心矛盾的诸多表现:心共口敌,性与情竞	144
第三节 颜之推对儒家中庸思想的选择与坚持	146

一、颜之推对儒家中庸思想的认识	146
二、颜之推中庸处世理念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147
第四节 颜之推对儒家思想振兴之努力	155
一、以儒家“修身”思想对士人的引导	156
二、以儒家“齐家”思想对士人对家庭担当的引导	158
第五章 儒学思想影响下的士人的思想和行为	161
第一节 儒家思想理念与曹操的思想和行为	165
一、“民为邦本”思想下曹操的民本思想	165
二、儒家精神与曹操的管理思想	175
三、儒学精神下的曹操社会教化	193
第二节 梁末北迁士人的史家意识	198
一、北迁士人史家意识的具体表现	199
二、北迁士人史家意识产生的因由	203
第三节 儒学影响下的政府对外交聘使的简选	207
一、以儒家经典为主体的渊博学识是聘使首要条件	207
二、以儒学为底蕴的博学同样是接待聘使者的首要条件	216
第四节 儒家精神与士族的家风建设——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 颜氏家风为例	219
一、外在文化素养：重儒学传家立身，重儒雅为业谋生	221
二、内在精神品格：以孝忠仁义立德，以正直守道立世	224
三、不懈的艺术追求：以书法传名扬世	228
第五节 从“吾于天下为不贱”到“拟迹桓文”	230
一、残疾为萧绎带来自卑	231
二、自卑导致萧绎的诸多消极行为	233
三、自卑促使萧绎积极进取	235
主要参考文献	238
后记	247

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外交及其影响

引言

东汉中期,自和帝始,皇权就遭侵蚀,由于即位皇帝幼小,因而朝政不得不或依外戚或靠宦官的辅助来运行,由此开启了外戚和宦官把持与干预朝政的局面。而外戚和宦官为了达到干预政治甚至控制朝政的目的,往往又和后宫紧密相连,组成一个操弄皇权的组织。至桓帝、灵帝统治时,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登上帝位的皇帝为了加强对皇权的支撑和维护,对外戚和宦官也是交替依附任用,特别是在外戚势力做大时,皇帝便由依靠外戚辅政转而依靠身边的宦官来剥夺外戚之权,想以此达到集中皇权的目的。由此宦官势力又不断增大,进而从外戚手里夺回的皇权又被宦官攫取、蚕食,以至于东汉后期的政治秩序往往因外戚和宦官的干政显得混乱失统,权力的使用得不到应有的约束,派系斗争也因此得以形成、发展,政治上的互相倾轧不断上演。与此同时,朝廷政治上的混乱又导致地方官吏贪赃枉法、鱼肉百姓、混淆是非等腐败现象的不断滋生蔓延,一如司马光所说:“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重以桓、灵之混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仇;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①最终引发黄巾大起义。然而,不管这时期政局怎样动荡、士大夫如何被压抑和打击、朝廷怎么昏暗,在所有人眼里东汉政权还是统一的王朝,皇权和皇帝依然至高无上,社会意识基本上也还处于大一统。

董卓乱京不但以下犯上,以地方武装势力直接进入京城,并代替京城卫戍部队辖制京城,也因暂时控制朝廷,生杀予夺任意裁之而高居皇权之上,此种行为无疑在宦官专制导致的政治混乱下进一步弱化和冲击着与皇权天生就连为一体的士大夫官僚体制。特别是董卓废帝酈后不但冲击甚至是破坏了两汉以来以儒学价值观建立起来的政治伦理体系,这使得统治阶级中士大夫阶层里部分人由此产生异心。如刘焉“观灵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欲避世难。议未即行,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城将乱,益州分野

^① 《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汉纪六十》,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2173 ~ 2174 页。